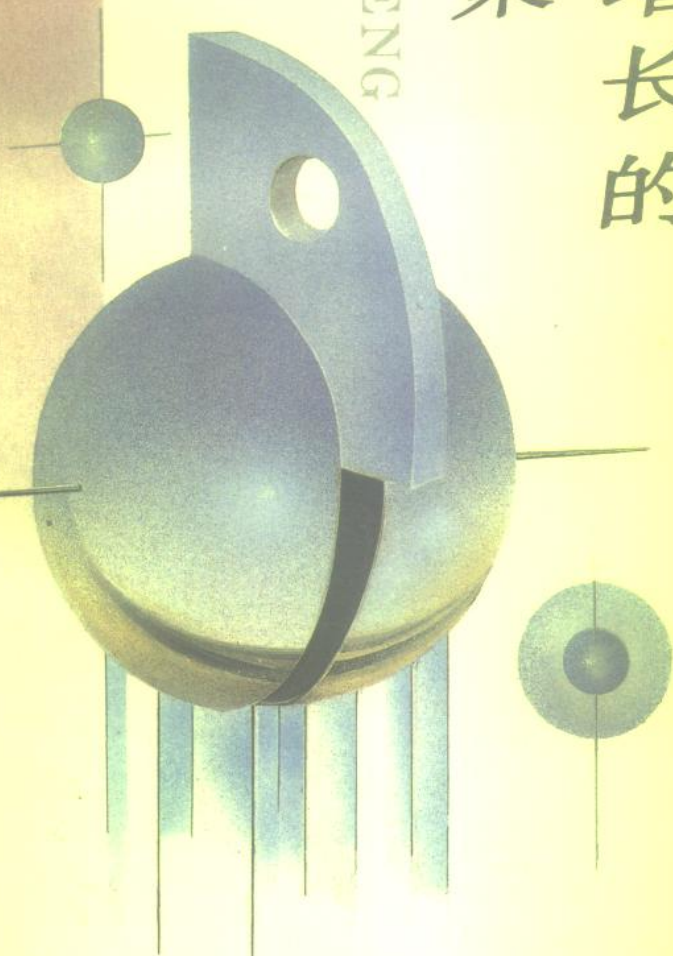


『适度经济增长』 理论与对策

• SHIDUJINGJIZENG
• ZHANGDELI
• LUNYUDUCE

熊映梧 孟庆琳 许正卿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fazhan
lun
tan
ni
de





发展与改革丛书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哈尔滨

适度经济增长的 理论与对策

熊映梧 孟庆琳 许正卿 著

(黑)新登字第5号

“适度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对策

熊映梧 孟庆琳 许正卿 著

责任编辑：张佳莉

封面设计：孙少江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区九站街1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4.5·插页2·字数104千

1993年7月第1版·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 7-5316-1924-5/F·80 定价：3.30元

《发展与改革丛书》

总 序

发展，是现时代的主题。一个社会，生产力越不发达，经济文化越落后，她解决社会问题的可选择性则越小；反之，生产力越发达，经济文化水平越高，她解决社会问题的可选择性越大。人类的出路，在于发展。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展，就必须进行改革。所以，我们这一套丛书命名为《发展与改革》。

积中华人民共和国 40 年之经验，我们得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富国富民的唯一正确道路。欧美的资本主义模式，在中国没有存在的客观基础；照搬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也是此路不通。我们经过三十多年的痛苦摸索，终于找到了这条光明大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厦，有两块基石，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离开了这“两论”，也就没有中国特色了。为了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标，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方面持续提高，逐步赶上发达国家。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当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大方向、大原则确定了，但是，怎样达到既定的目标，有许

多艰难的工作要做。例如，怎样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怎样把发展速度与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一致起来？在改革方面，最大的难点在于找到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最终目标的途径、形式、步骤、方法。不少学者和企业家都指出了“承包制”不可避免带来短期行为、负盈难负亏等副作用，但是，又不可能一下子都变成股份制、合作制。那么，在承包制与股份制、合作制之间怎样找到一种过渡形式呢？诸如此类的有关发展与改革的重大问题，有待大家去苦心探索，深入研究。

出于历史责任感，我们龙江学派的一些学者高兴地接受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委托，计划在三五年内编辑出版一套《发展与改革》丛书。这一套丛书不是代圣贤立言，或者注解现行政策，也不是单纯介绍外国的学术思潮，而是立足于本国，探讨发展与改革中的新课题，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略尽绵薄之力。

我曾经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张文达社长有一段对话：

我说：要不拘一格出好书，题材不拘一格，观点和文风也不拘一格，唯新唯好。

张社长答：我社要不惜赔钱出好书！

在今日一片赚钱声中，我们听到这种支持学术事业的声音，是多么惊奇，又多么兴奋啊！不少乡镇企业超过国营大企业，同样，小出版社也可以干出大事业，只要有这种为发展学术事业不惜赔钱出好书的方针。

人类学家麦克斯·格拉克曼曾经说过：“科学是一门学问，它能使这一代的傻瓜超越上一代的天才。”本书的作者似乎比傻瓜还高明一点，我们为什么不能超越上一代的天才呢？

熊映梧

1992年1月于冰城

关于“适度经济增长”的理论与战略建议，我们在80年代前期的系列论著^{*}中再三提到并作了详细的论证。可喜的是这一见解日益受到关注，开始进入决策层的视野。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相结合的角度，深入探讨这个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首先，有必要阐明“中国经济适度增长”问题不是从书本上提出来的，而是现实生活迫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其二，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作出科学的回答：究竟“高速度经济增长”还是“适度经济增长”是一种客观经济规律？其三，需要给予“适度经济增长率”概念一个科学的界定，并运用统计资料加以证实。其四，尤为困难的是提出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以实施“结构优化的适度经济增长”战略。否则，再好的理论也只是纸上谈兵，并不能改善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借用一句马克思的话，不管人们对这个研究报告如何评论，它总是作者“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

* 见熊映梧著《生产力经济概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略论“结构型”再生产模式》（《学习与探索》1984年第5期）、《“翻两番”的经济学思考》（1985年7月8日《人民日报》）、《宏观经济控制的重、要一环——选择适度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展望》1985年第1期）。

目 录

一	提出“适度经济增长论”的历史背景	1
二	适度经济增长的客观必然性	15
三	适度经济增长率的界定	27
四	投资与经济增长	33
五	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	58
六	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	74
七	经济增长速度与瓶颈问题	91
八	分阶段多层次的适度经济增长	101
九	实现适度经济增长的机制	108
十	结论	114
	后记	117

一 提出“适度经济增长论” 的历史背景

“适度经济增长论”不是坐在书斋里冥思苦想出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抄下来的，而是现实生活迫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把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视为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或称之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而多年一贯地推行以高速度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

苏联在二、三十年代工业化时期，拼命追求高速度经济增长。从权威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简称《教科书》)披露的情况，可以大致看到那个时期的概貌。

《教科书》这样论述“高速度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据是：

“工业化的速度对于苏联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

“苏联发展的外部条件是由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所决定的。帝国主义国家拥有较强大的工业基础，它们力图消灭或至少削弱苏维埃国家。……可是苏联是一个技术上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并且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此，必须以高速度建立先进的工业基础。

“苏联发展的内部条件同样要求高速度的工业化。当时苏维埃国家仍然是小农国家，其中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为了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必须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在以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集体劳动的基础上，改造分散的私有制的农民经济，使资本主义丧失在小商品生产中的基地。因此，必须迅速发展重工业。”①

《教科书》还引用了列宁的名言来强化自己的论据。列宁说：

“革命所已经做到的，是俄国按其政治制度来说，在几个月内就赶上先进国家了。”“可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斩钉截铁地提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②。

以上的主张纳入了当时最高领导机关的决议。1928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1月全会曾强调指出：“鉴于必须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中央全会指出，只有加速发展工业和实行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只有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才能解决这些任务。”③

上述论据，显然都是从政治上的需要方面讲的，而未涉及高速度经济增长的客观可能性。

苏联高速工业化的方针，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及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具体地反映出来了。据说，这些长期发展目标都大大超额完成了。《教科书》提供的资料是：从1913年到1940年，苏联全部工业产值增长了7.5倍，而大工业④产值增长了近11倍。大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13年的42.1%

①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6页。

②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卷第354页。

③ 《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分册第463—464页。

④ 苏联所谓“大工业”是指机器工业，有别于手工业。

提高到1937年的77.4%^①。但是，苏联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以太量的历史资料揭露，斯大林为了打击反对派，谎报成绩，所谓“超额完成”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云云是不真实的。这一桩历史公案在此存而不论。即使假定苏联公布的资料是真实的，也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

——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是某一时期、某些部门的较快发展，而不可能是长期的、全面的高速增长。前苏联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重、轻、农三大产业部门发展很不平衡。据《苏联国民经济60年》的资料：1976年与1913年相比（以1913年为1），工业中生产资料产值为328，工业中消费资料产值为43，农业总产值为3.3^②。

——采取不正当的积累手段，造成严重后果。苏联在推行高速度工业化战略过程中，是依靠中央集权机构，通过不正当的积累手段筹集资金。苏联筹集巨额工业化资金的办法有这样几种：（1）高积累；（2）通过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收取“特种贡税”。斯大林在《论工业化与粮食问题》（1928）中讲：“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因价格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③实际上，这种贡税的数量是惊人的。例如，1940年苏联预算收入为180亿卢布，其中周转税108亿卢布，占59%^④。这种周转税主要是农民创造的价值。这从谷物采购价格与采购组织销售价格对比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小麦，8.85卢布/公担、104卢布/公担；黍，5.72卢布/公担、91卢布/公担^⑤；

① 见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73—374页。

② 见《苏联国民经济60年》，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39页。

④ 《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22—1972）》第484页。

⑤ 《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22—1972）》第484页。

(3) 苏联筹集工业化资金的另一重要途径，就是把现有工业固定资产的折旧费当做国家财政收入，再通过国家预算拨款转为基本建设投资。这种“挖肉补疮”的办法，必然使现有工业企业缺乏技术改造的资金，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经济效益也好不了。苏联用这种损害农民利益及现有工业的政策推进高速工业化，必然造成大量企业亏损，经济效益差。斯大林讲的“高级盈利”同中国说的“要算政治帐，不要算经济帐”，都是为低效益辩护。

——片面地高速发展重工业，实质上是搞军事工业体系，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使苏联农业、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人民生活长期停留在低水平线上，国家财政承受不了大量的对亏损企业的补贴及价格补贴，所以难以为继。苏联在解体前，经济已陷入停滞、衰落状态。以下的统计数字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形。

表 1

%

	1976—1980	1981—1985	1986—1989
工业产值增长率	4.4	3.6	3.4
国民收入增长率	4.3	3.2	2.7

资料来源：《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5期第16页

总之，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两者的合力，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冲垮了。苏联七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了：出于政治需要，片面追求高速工业化，虽然也可以在短期内拼出一个“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但是，代价太大，而且难以持久。紧接着一段高速增长之后，必然是一段经济停滞，甚至是负增长。从长期来算总帐，如对苏联70年作综合评价，速度并不快，效益却很差。苏联作为超级大国之一，掌握了最先进的军事

技术，但却无力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岂不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其实，过去由于我们没有经验，照搬过苏联的模式，也曾经吃了很大的苦头。

熊映梧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考察》^①对新中国 40 年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作了详尽的描述，指出“新中国 40 年的成就超过先前一切世代，国力大大增强”；“在经济上创造了少有的高速度，但是经济运行的轨迹显示出很大的跳跃性、波动性”。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指数，若以 1952 年为 100，则 1949 年为 56.3，1988 年为 2261.8，即 40 年内增长 39.2 倍；其中，工业总产值指数，1949 年为 40.8，1988 年达到 5525.4，增长 134.4 倍；重工业更快，1949 年为 30.3，1988 年为 8085.8，增长 265.8 倍^②。在这种高速增长背后，隐藏着令人忧虑的问题：经济运行大起大落，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如工业总产值年增长率在 30% 以上的有 5 年，在 20% 以上也有 5 年，在 10% 以上有 12 年，在 5% 以上有 7 年，在 5% 以下有 3 年，有 4 年是负增长。1958 年工业增长率高达 54.8%，1961 年是 -38.2%，波峰与谷底相差 93 个百分点^③。三年大跃进与接踵而至的经济危机，形成极强烈的反差。我们不妨把这几年的工业增长率列表如下（见 6 页）加以分析：

表 2 说明：（1）超常规的“大跃进”之后，紧接着是大跌落，1958 年与 1961 年相差 93 个百分点，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2）“大跃进”的成绩有很大的水分（有大量的佐证材料），而调整时期的数据则比较可靠，因而 1958 年与 1961 年在增长率上的反差，实际上小于统计数；（3）若以工业总产值指数来分析，以 1952 年

①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研究课题，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② 见《奋进的四十年》，统计出版社 1989 年出版，第 347 页。

③ 见《中国统计年鉴 1989》第 53 页。

表 2

工业增长率比较

大跃进时期		调整时期	
年 份	年增长率(%)	年增长率(%)	年 份
1958	54.8	-38.2	1961
1959	36.1	-16.6	1962
1960	11.2	8.5	196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89》第 347 页

为 100，1957 年为 228.6，1962 年为 276.0，折腾了五年，几乎原地未动。如果考虑到“大跃进”造成的严重比例失调，投资的巨大浪费，资源的空前破坏，民众生活的极端困苦，等等，“大跃进”真是大大的得不偿失！

中国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甚大。我们对各不同时期的经济运行略作分析，即可见一斑。

1. 低基数、高速增长时期（1949～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建立后，虽然花了 3 年多的时间医治战争的创伤，进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以及其他社会改革，但是，还是着力进行了稳定物价、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并取得很大的成绩。

从总产值方面看，1949～1952 年期间，工农业总产值从 466 亿元增加到 810 亿元，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份工农业总产值 688 亿元（估计数）的 17.7%；农业总产值从 326 亿元增加到 461 亿元，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份农业总产值 408 亿元的 12.9%；工业总产值从 140 亿元增加到 349 亿元，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份工业总产值 280 亿元的 24.6%。三年恢复期间，经济增长率是很高的，但是，这是恢复原有的生产能力，不同于创造新的生产力，因此比

较容易办到；而且，由于基数小，较大的增长率也只是代表较小的绝对增加额。3年工农业总产值共计增加344亿元，平均每年增加114.6亿元，按人口平均每年仅增加22元多，显然增长额是甚小的。

再从实物量看，1949～1952年期间，粮食从11318万吨增加到16392万吨，棉花从44.4万吨增加到130.4万吨，原煤从3200万吨增加到6600万吨，发电量从43亿千瓦小时增加到73亿千瓦小时，钢从15.8万吨增加到135万吨……均超过、甚至大大超过历史上最高年产量。

“一五”时期（1953～1957年），公认是新中国40年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经济增长率比较高，产业结构有很大改善，经济效益也比较好。

从经济增长率来看，“一五”时期平均年增长率比1953～1988年间平均年增长率只高一些，前期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年增长率分别为9.1、9.2，后期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分别为7.1、6.9，相差2.0～2.3个百分点，高出并不多。我们认为，“一五”的历史功绩主要是集中力量建设了156个重点项目，填补了国民经济的空白或增强了薄弱环节，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所谓“黄金时代”，也只是相对于后来的大动乱而言。细心观察一下，不难发现，把“一五”同“大跃进”联系起来，出现了中国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第一个“马鞍形”“谷底”。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是-0.9，农业是-12.0，工业是9.7，与“左峰”1953年的18.5、10.6、28.9分别相差19.4、22.6、19.2个百分点，与“右峰”1958年的32.9、5.4、53.8分别相差33.8、17.4、44.1个百分点。这样大的波动，恰恰是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密切相关的。

1955年上半年，当农村合作化运动出现冒进的倾向时，适时地进行了所谓“反冒进”的整顿工作。但是，毛泽东对于这种“小

脚女人”的“严重右倾机会主义”给予了尖锐的抨击，他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写下这样的“按语”，“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①在这种“反右倾”政治运动的带领下，到1956年底，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1.18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占87.8%^②。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或者更长时间完成的任务之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没有用一个五年时间就“胜利完成”了。就全国范围而言，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新生的制度仅仅存在了一年多，还来不及发挥其优越性，又被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冲走了。从此，中国农业进入了长达20多年的萧条时期。50年代，中国轻工业的原料70%来自农业。农业停滞不前，必然限制了轻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 大起大落及动乱时期（1958～1978年）

这一阶段长达20年，经济运行受到政治的干扰最严重。作为起点的1958年“大跃进”，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是政治运动的产物。在1955年反对“小脚女人”的推动下，1956年提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限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自然地要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1957年在全社会开展反右派斗争，在领导层批判1956年反冒进，都为1958年大跃进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记录了有关上述历史的重要资料：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33页。

② 《奋进的四十年》，第21页。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强调“不断革命”的思想，再次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这次会议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有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继续批判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已基本形成。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毛泽东倡议的这条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是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讲话，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会后，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1958年6月，《红旗》杂志创刊号发表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认为“我国在工农业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又说：“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1958年6月，毛泽东批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报告说：“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报告转发后，工业上的高指标、浮夸风日益泛滥。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宣布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①……

① 以上资料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8～294页。

从上可见，“大跃进”是人为的，缺乏客观的依据。3年大跃进给中国经济运行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至今我们后代人还要啃这个苦果。

从指数看，工业1958年比1957年增加125.3，1959年再比上年增加127.9，1960年再比上年增加53.9，3年共增加307.1；而1961年一下跌落到330.8，1962年再下跌到276.0，高峰(1960)与谷底(1962)相差259.7。农业指数高的年份(1958)为127.8，低的年份(1961)为94.1，相差33.7；再从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看，一时高到32.7%(1958)，一时又跌到-33.5%(1961)(详见表3)。

表3 1958—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及国民收入指数
(以1952年为100)

年 份	工农业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	国民收入
1957	167.8	124.8	228.6	153.0
1958	221.8	127.8	353.9	186.7
1959	264.9	110.4	481.8	202.0
1960	279.3	96.4	535.7	199.1
1961	192.6	94.1	330.8	140.0
1962	173.1	99.9	276.0	130.9
1963	189.6	111.5	299.4	144.9
1964	222.9	126.7	358.1	168.8
1965	268.3	137.1	452.6	197.4

资料来源：《奋进的四十年》，第341、347页。

本来，大跃进的失误是可以早点纠正的。但是，由于1959年庐山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及八届八中全会）继续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而延续了大跃进的蛮干。这也再次证明了中国经济发展时常是服从政治的需要，而不是马克思讲的“自然的历史过程”（《资本论》序言）。